

□燕行录研究

“燕行录学”刍议

漆永祥

[摘要] “燕行录学”即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燕行录”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闻见录。“燕行录”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共名与单名之别。在对“燕行录”称名与概念，创作与编纂的历史分期，整理、辑佚、翻译与数据库建设，文献重复与抄袭，史料价值与真伪以及“燕行录”研究中应持有的态度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梳理、考辨与论述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建构“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应设立相应的研究学会，以指导与协调“燕行录”的研究。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迫切。

[关键词] 燕行录；燕行录学；燕行使；整理与研究；治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I31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3-0001-15

[收稿日期] 2018-11-18

[作者简介] 漆永祥，男，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清代考据学、清代学术史、东亚文化与文学、“燕行录”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与高考等。（北京 100871）

一、建构“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当历史跨入21世纪之后，随着原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编纂的《燕行录全集》100册的面世，“燕行录”的整理与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进，经过十余年的持续升温，时至今日形成了繁荣兴盛的大好局面。我们可以谨慎而乐观地判断：建立“燕行录学”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有其迫切性与必要性。

首先回顾一下“燕行录”整理与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的日据时期，韩国《青丘学丛》第1号出版了《朝鲜事大纪行目录》，共著录燕行文献57种，并整理出版了苏世让的《阳谷赴京日记》等。1935年，当时的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整理的《奎章阁丛书》中，即有《昭显世子沈阳状启》。此后迟至1962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了《燕行录选集》，共收录“燕行录”30种（2008年出版《补遗》20种）。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出版了韩语翻译本《国译燕行录选集》。而2001年，由东国大学林基中教

授编纂的《燕行录全集》100册357种繁体行，成为“燕行录”研究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同年，林基中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合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册33种出版。此后，林教授又于2008年出版了《燕行录续集》50册170种（含《日本所藏编》），《全编》与《续编》共收录约527种。此后又编成PDF电子版《燕行录丛刊》，共收录455种（后又有续补，总计约560种）。可以说在“燕行录”整理与研究方面，韩国学术界此前一直走在前列。

中国学者对“燕行录”文献的关注，也几乎与韩国本土同时。20世纪30年代，金毓黻教授主编的《辽海丛书》即收有柳得恭《溇阳录》与《燕台再游录》。此前的1916年，朴趾源《燕岩集》在中国南通以铅活字重刊。1978年，台北珪庭出版社出版了《中韩关系史料辑要》，其第二卷收录有明代《朝天录》4册36种。

2011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合作编纂《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册33种。在2010~2016年间，由弘华

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第1-4辑共46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据称这套书出齐后,共包括500多位作者,700余部专著,概括了公元13~20世纪初总700年的中韩交流史。而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在张伯伟教授主持下,也正在进行部分“燕行录”的点校整理,至于收录多少种“燕行录”,因成果尚未出版,具体数量目前还不清楚。

在“燕行录”的研究方面,在韩国,1934年金台俊在《朝鲜汉文学史》中对朴趾源《热河日记》曾做过简单的论述与评价。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金圣七《燕行小考——朝中交涉史一瞥》、全海宗《清代韩中关系综考》等相继发表。2006年,由韩国崇实大学曹圭益教授等选编的《“燕行录”研究丛书》共收录10册130余篇论文,分为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意识、服饰、建筑、绘画、地理等类,可以认为是韩国学术界“燕行录”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近十余年来,更是新作不断涌现,呈蓬勃发展的态势。

1967年,台湾学者张存武教授发表的文章《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为海峡两岸研究“燕行录”之始。而大陆由于受中韩断交的影响,直到1997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政尧教授发表《〈燕行录〉初探》一文,对“燕行录”进行评介。但在进入新世纪初的头几年,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燕行录”仍不了解。2005年,在韩国从事研究工作的内蒙古大学邱瑞中教授焦虑地指出,当时销往中国的《燕行录全集》还不足十部,而接触的中国明清史研究专家,多是“利用”燕行录,而不是专门研究。因此,“在中国和韩国,通读燕行录,从中发掘出中国历史、文化、政治问题的专家尚未形成”。^{[1](237)}

但随着中韩两国学术界交流的不断深入和《燕行录全集》传入中国,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燕行录”研究的热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在上世纪90年代中韩建交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延边大学等校陆续成立了韩国国学研究中心,同时如北京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等,都聚集了一批人才,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成为了稳定的“燕行录”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其二,一批研究者如葛振家、王政尧、李岩、邱瑞中、葛兆光、张伯

伟、陈尚胜、王勇、徐东日、刘顺利、刘为、祁庆富、王元周、孙卫国、杨雨蕾、左江等,老中青相结合,在“燕行录”研究方面成绩突出,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三,如前所述,在“燕行录”的再度整理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后来居上,成为主力;其四,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燕行录”为研究课题的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相应地出现了一批同题的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中青年学者成为了研究前沿的新兴力量。

总体来看,目前“燕行录”的整理与研究,无论是文献整理的力度,还是出版专著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中国大陆学术界已成为“燕行录”研究的主力军。

但随着“燕行录”研究人员的不断增加,探讨问题的不断深入,在诸如“燕行录”称谓的争论与歧义,“燕行录”的整理、辑佚与翻译,“燕行录”史料的真伪与考辨,以及“燕行录”与燕行使研究中的孤立、片面与绝对化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问题,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乱象丛生,“燕行录”的研究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亟需必要的指导与协调。

邱瑞中教授曾在2005年时就“呼吁更多的人将燕行录当成研究的对象,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即‘燕行录学’”。并且认为,“‘燕行录’学应该成为21世纪世界历史学的新标志。在这个世纪,世界历史学界还会出现一些巨大成就,‘燕行录学’应该能够占有一席之地”。^{[1](235-237)}韩国学术界在编纂《“燕行录”研究丛书》时,也曾提出过构建“燕行录学”的倡议。

笔者于2017~2018年间,受韩国高丽大学之聘,任该校中语中文科全职教授两年。在韩国工作期间,接触到“燕行录”文献并开始通读《燕行录全集》与《韩国文集丛刊》等有关史籍,陆续撰写了《〈燕行录全集〉考误》《燕行使笔下的神丹“清心丸”》等系列论文,同时采访韩国有关学者,并深入到韩国各地进行与“燕行录”相关的实地调研。回国至今,继续在做《“燕行录”1000种解题》《从观礼朝圣到行蛮貊之邦——朝鲜燕行使与〈燕行录〉研究》《〈燕行录〉北京史料类编》等课题的研究工作,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虽然成果不多,但仍在孜孜矻矻地读书撰文,也密切关注着“燕行录”研究的成果与动态。

在韩国期间,笔者曾数次拜访《燕行录全集》编纂者林基中教授,并探讨“燕行录”研究的问题与前景,以及建构“燕行录学”与成立相关研究机构的可能性。在高丽大学工作期间,也常和崔容澈教授宴谈,崔教授也希望能够成立类似“东亚燕行录研究学会(或中心)”的学术机构,并希望设在中国,最好是在北京大学,希望笔者来牵头组织与协调。笔者认为自己学疏才浅,既不通韩语,“燕行录”研究成果也不突出,而且更无人员,亦无经费,所以表示对此事并不感兴趣。此后的2012年,宁侠、李岭、曹永年等在为邱瑞中《燕行录研究》一书撰写的书评《为“燕行录学”的建构呐喊》一文中,再度呼吁建构“燕行录学”。^{[2](107~110)}此前的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上海主办“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葛兆光教授提出在观念上重新认知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在文献上激活相当多的过去不曾重视的日本、韩国、越南有关中国的资料,在方法上刺激多种语言工具的使用和学术视野的扩展,并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而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在张伯伟教授带领下,也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就“燕行录”研究的文献、内容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讨论。^①在理论探索与研究方法等方面,他们起着开路先锋并引导来学的重要作用。这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创设“燕行录学”并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与团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笔者认为,“燕行录”研究在今天已经打下了理论基础,储备了丰富的资料,培养了充足的人才,出现了丰硕的成果,并且有课题与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建构“燕行录学”与设立相应的研究学会,聚集同仁,协同研究,扩大影响,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已然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并且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

二、“燕行录”“燕行录学”的称谓、概念及研究对象

(一)“燕行录”称谓与概念问题

众所周知,“燕行录”大量出现在朝鲜半岛

的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基本上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有少量金、元时期的作品)。朝鲜半岛在明代出使的使行文献当时多称为“朝天录”,清朝出使的多称“燕行录”,而近现代以来也随之通称为“燕行录”。

台湾学者张存武教授统称“燕行录”为“华行录”。近年来张伯伟教授主张,此类文献应该通称为“中国行纪”,因为“由‘朝天’转变为‘燕行’,绝不仅仅是指代一个地理方位,而是充满了政治意味和文化立场的特殊名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言,使用这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称谓,无论是‘朝天’还是‘燕行’,都是不合适的”。^{[3](8)}张教授进而指出:

我提倡使用“中国行纪”来概括此类文献,理由有三:第一,这是一个较为中性、客观的用语,适合于在学术讨论中加以运用。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理由,即追根溯源,此类文献之祖就是以“行纪”命名的。第三,“行纪”是现代学术研究中使用的共名。^{[3](8)}

此说固然有理,但笔者认为称“燕行录”为“中国行纪”,也并未解决其中涉及的所有称谓问题。因为,“燕行录”的名称,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以奉使录为主的“燕行录”,总括各类行纪的“燕行录”,共名之“燕行录”与单名之“燕行录”。

什么是“燕行录”?“燕行录”收录应该限定在什么范围内?这是一个必须率先厘清的问题。笔者曾在《〈燕行录全集〉考误》一文中,将“燕行录”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

“燕行录”,窃以为就广义而言,凡履迹及中国之朝鲜人所著书,皆可谓之“燕行录”也;若就狭义言之,则专以朝鲜国王遣往中国之使臣或随从所著之书,方可谓之“燕行录”耳。笔者以为,《燕行录全集》所收,当以狭义之“燕行录”为收录原则,即凡非燕行使团中诸人所作者,皆不可谓之“燕行录”。否则,若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等书中,凡涉中国之诗文,皆谓之“燕行录”,则泛滥而无涯涘矣。^{[4](234~235)}

^① 详参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总第90期),2005(8);又参张伯伟:《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载郑光等编:《燕行使与通行使》,首尔:博文社,2014年,第485~503页。

为什么要如此说?首先我们来看看“燕行录”三字当如何解释?“燕行录”如果要再翻译成现代汉语,而且硬抠直译的话,那只能是“行往北京的纪录”,或者“往来北京的纪录”;如果宽泛意译的话,就是“往来中国的纪录”。但这两种翻译或理解,实际都不准确,都被“燕行录”三个汉字的字面义所蒙蔽了。

如果我们将“燕行录”与中国士大夫所撰同类书籍做对比,就会发现此类书最客观中性的称名应该是“奉使录”或“使行录”。自先秦时期《周官》“小行人”之职,即有“輶轩使者”乘车往各地采俗观风,返朝后书奏报上的制度。到宋、辽、金时期,诸国相争,使车频繁,此类撰著较前繁盛。如北宋路振《乘轺录》、王曾《行程录》、刘敞《使北诗》、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南宋陶悦《使北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洪皓《松漠纪闻》、楼钥《北行日记》、范成大《揽轡录》等,以及使臣回国后向朝廷所上《语录》及其他闻见录等。

宋元以降,中国遣往朝鲜的使臣所撰有宋代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明代有倪谦《奉使朝鲜倡和集》与《朝鲜纪事》、张宁《奉使录》、董越《朝鲜赋》与《朝鲜杂志》、龚用卿《使朝鲜录》、朱之藩《奉使朝鲜稿》、姜曰广《輶轩纪事》,清代阿克敦《东游集》与《奉使图》,柏葭《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魁龄《东使纪事诗略》、马建忠《东行三录》、崇礼《奉使朝鲜日记》等。

如果像“燕行录”代指朝鲜近700年间使臣所撰之书,用一个书名来概括的话,那么中国使臣的著作,可以用《奉使录》或《使朝鲜录》来代称。^①而朝鲜使臣所撰“燕行录”,与中国使臣一来一往,一西一东,而书名含义并没有不同,由此也可以比照推断,“燕行录”之“行”,与“奉使录”之“使”,字异而义同,皆为“使行”“出使”之义。所以“燕行录”实际即“奉使录”“使行录”或“使燕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泛指“往来北京的纪录”。在朝鲜朝末期所编的《同文汇考补编》中,其所收历年出使清朝的使行与官员名单,恰恰就称之为“使行录”,^{[5](1700)}也充分证明了笔者的观点。

因此,笔者认为,“燕行录”就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往来中国的闻见录。一部书是否算是“燕行录”,必须具备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一是作者必须是由国王派遣的正式使臣,或是使团中的某个成员,或者是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官员;二是作者必须到过中国(或者到过两国边境的中国境内)。如果要再增添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撰著者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其书必须是有关朝鲜半岛出使成员的纪行录,否则就不能算做“燕行录”。

“燕行录”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还有共名与单名之别。现存千余种“燕行录”,各自书名(或篇卷名)的来源与取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这些文献如果从其版本流传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单行本与非单行本。单行本即该书从一开始就是以单独书籍的面目出现,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崔德中《燕行录》、李器之《一庵燕记》等;非单行本就是从各家别集或其他书中辑出者,如徐居正《北征录》、柳梦寅《朝天录》、李晚秀《輶车集》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既有单行本,又有别集本,如朴趾源《热河日记》、柳得恭《辽野车中杂咏》等。一般而言,单行本内容量大,或为一卷,或为多卷,书名也相对固定;而依附于别集的则内容量小,或一卷以上,或为一卷,但大多数不足一卷,仅有诗数首或者数十首,其篇卷名,则或有或无,视具体情况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正因为如此,诸家“燕行录”的书名来源,大致就有四种情况:一是其书撰成之时就已有名称,如洪良浩《燕云纪行》、申纬《奏请行卷》、李肇源《黄梁吟卷》等;二是编入作者别集时的篇卷名,或者是作者自取,或者是整理者所加,如李安讷《朝天录》一卷、李景奭《西出录》二卷、申晷《燕行录》一卷等;三是《燕行录全集》的编纂者林基中教授在辑录时所取名称,如金中清《朝天诗》、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洪命夏《癸巳燕行录》等;四是笔者所辑为《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未收者,如李穡《使行录》、申叔舟《辽东问韵录》、俞泓《朝天诗》等。

① 以上数种书,皆收入殷梦霞、于浩选编:《使朝鲜录》(上、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该书就统称所收诸种书为“使朝鲜录”。

从现存“燕行录”名称来看,整理者所取占到一半以上。如果原书有书名或篇卷名,那么辑录者应该最大限度地遵从原名,若原无篇卷名则可以根据情况为其取名以为区别。在《燕行录全集》中,有些使行录原本有篇卷名,但辑录者却另为取名,如上引金中清之书,《燕行录全集》辑录时取名为《朝天诗》,实际金氏诗集自有其名。其自跋曰:

斯作也,何以谓《燕程感发》也?余非从事吟咏者也,于诗自知非所长,而或遇事物之来,有所动于中,不能无蔼然之情,于是乎情以言形,而其言之工不工,有不暇焉者,余之习亦痼矣。今余往来燕都,远之为数千里,久之为夏秋冬,山川崖谷,州府亭院之形胜,鸟兽草木人物之奇怪,风雨霜露之变态,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芬华、酣醉、无聊、不平,婴乎外而动于内者,不知其几千万幻,而情之所感,言不得不发,随感随发,欲已而未已,不耻芜拙,成辄题之,凡若干篇。……是用誊诸册子,名以是名,以为私弃。噫!不曰“稿”而曰“感发”,其拙可知矣。^[6](384-385)]

此跋作于金氏在玉河馆时,且其诗《坡州道中口占》目录与卷中正文诗题下注亦皆称“此下《燕程感发》”,^[6](325)]则知其稿原名《燕程感发》,编纂者不察,而冠以《朝天诗》,则非金氏原意原名可知矣。

又如,《燕行录全集》第十九册所收郑太和《阳坡朝天日记》,实为其《饮冰录》,此为郑氏于朝鲜朝仁祖二十七年(顺治六年,即1649年)出使清朝时所作。入清后朝鲜使臣所撰纪行录,或书明崇祯年号,或仅用干支纪年,但坚决不用清帝年号,以示其忠明而厌清。故其书之名,或曰“燕行”、或曰“饮冰”、或曰“西行”、或曰“含忍”等,绝不再用“朝天”之词,故此稿若题“朝天日记”,则又大乖作者原意可知。

《燕行录全集》与《燕行录续集》所收诸家“燕行录”,这种随意题名的情况,尚有不少;再加上因错讹而张冠李戴者,亦不在少数。后人于前人之书,不能轻改书名,或随手题写,当思其委曲隐深之意。因此,“燕行录”之共名与单名,尚有进一步考证探讨与纠谬补缺的必要,做到既名符其实,又不厚诬古人,方为妥当合理的做法。

因此,笔者以为就今日学术界的情形而言,将这些使臣所撰写的纪行文字称为“燕行录”,未尝不可。笔者的理由是:其一,此千余种纪行录,有广义、狭义、共名、单名之分,既相互重叠,又各自有别,而无论是原作者所取书卷名,还是后世整理者所取名,以“燕行录”为最多,本着书从原名、尊重事实的原则,不宜更改书卷名;其二,就文献追根溯源而言,固然多称“行纪”,但称“纪行”者亦复不少,宋元以来称“行程录”“奉使录”“使行录”“使燕录”者更多,故改为“行纪”既不足以代表此类文献的祖名,也不能完全代表现代学术研究中使用的共名;其三,相较“朝天录”“观光录”与“饮冰录”“含忍录”“看羊录”之类的称名,称为“燕行录”相对中性而客观,是可以接受的;其四,“燕行录”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与色彩,正是其有别于其他“行纪”或“纪行”的主要特征,既无需讳言,更不必避忌,如果改换成纯粹客观的称谓,反而失却本色,会带来诸多不便。

(二)“燕行录学”及其研究对象

前已论及,“燕行录”就是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出使中国的使臣所撰写的纪行录,其时代纵跨自13世纪初的高丽王朝后期与几乎整个朝鲜王朝时期前后近700年的历史。“燕行录”体裁诸体皆备,包括诗歌、日记、游记、札记、别曲、奏疏、咨文、别单、状启、闻见事件、路程记与地图等;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文化、教育、戏曲、旅游、宗教、文物、建筑、绘画、地理、交通、民俗、服饰、饮食等,资料丰富,包罗万象,是研究中韩两国古代交往史与东北亚历史的重要文献。

“燕行录学”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燕行录”及相关问题的学问,其内容应包括“燕行录”的称谓,研究理论与方法,创作历史与分期,整理、辑佚与翻译,体裁与内容,史料价值与真伪,“燕行录”与《皇华集》《漂海录》等非燕行录的关系,燕行使个人与使团,“燕行录”资料数据库建设以及“燕行录”与东北亚历史的相关研究等,应该都是“燕行录”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现今所见最早流存于世的“燕行录”,是高丽朝高宗二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即1215年)陈湲出使金朝时所撰的诗歌,见其《梅湖遗稿》中,笔者辑为《使金录》,其实仅存有两首诗而已;最晚的是朝鲜高宗三十一年(光绪二十年,即

1894年)六月发往汉城的进贺兼谢恩行使团成员金东浩所撰《甲午燕行录》。在长达近700年的时间里,截至目前共有740余位燕行使所撰写的1040种“燕行录”流布于世,可以说是历时久长,持续不绝,作者众多,著述繁富,的确是书籍史上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

三、“燕行录”创作与编纂的历史分期

前已述之,在长达近700年的时间里,共有740余位燕行使所撰写的1040种“燕行录”流布于世。今按其创作编纂的年代,大略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型期、成熟期、鼎盛期与衰微期六个阶段。

(一)“燕行录”初创期

这一阶段的截止时间为高丽朝高宗二年至恭让王三年(金宣宗贞祐三年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即1215—1391年)。在这一阶段,高丽政局动荡,与元朝及后来灭元继起的明朝关系不稳,甚至一度恶化。使臣王事鞅掌,奔波于路,流传下来的“燕行录”相对较少,共有14种,无单行本,多附于高丽诸家文集而行,其作品大多数为诗歌,如陈湑《使金录》、金圻《北征录》、李承休《宾王录》、李齐贤《清游稿》、李穀《奉使录》、郑誦《上国游稿》、李穡《使行录》、金九容《奉使录》与《流云南》、郑梦周《赴南诗》、郑道传《奉使录》、李崇仁《奉使录》、权近《奉使录》、赵浚《朝天诗》等。

(二)“燕行录”发展期

这一阶段的时限为朝鲜朝太祖元年至明宗二十二年(明太祖二十五年至隆庆元年,即1392—1567年)。在这一时期,随着朝鲜朝与明朝关系的趋向稳定,家国平和,百姓安居,双方正常往来,使节不断。除了诗歌之外,后世“燕行录”的主要体裁日记与札记等皆已出现,共有43种,代表作有李簪《观光录》、张子忠《判书公朝天日记》、成三问《朝天诗》、申叔舟《朝天诗》、金守温《朝天诗》、鱼世谦《己卯朝天诗》、徐居正《北征录》、成倪《观光录》、崔叔精《朝天诗》、洪贵达《朝天录》、申从濩《观光行录》、李荇《朝天录》、金安国《燕行录》、苏世让《赴京日记》、苏巡《葆真堂燕行日记》、崔演《朝天诗》、郑士龙《朝天录》、尹根寿《朱陆异同》、柳中郢《燕京行录》等。

(三)“燕行录”成型期

这一阶段是从朝鲜朝宣祖元年至光海君十四年(隆庆二年至天启二年,即1568—1622年),其特点是围绕“壬辰倭乱”与光海君王位的正当与否等,朝鲜朝遣往明朝的使臣急如星火,络绎于道;后期由于满洲在东北的崛起,辽东路塞,海路朝天线路再开。“燕行录”数量激增,共有129种,卷帙增加,内容庞杂,体裁较前更为丰富,代表作有许筠《荷谷先生朝天记》、赵宪《朝天日记》与《东还封事》、金诚一《朝天日记》、裴三益《朝天录》、李晬光《庚寅朝天录》、洪纯彦《唐陵君朝天奇事征》、郑昆寿《赴京日记》、崔岵《四行文录》、申钦《甲午朝天录》与《甲午朝天路程》、申忠一《建州闻见录》、黄汝一《银槎日记》、李民宥《壬寅朝天录》、李廷龟《甲辰朝天录》、申钦《奏请使朝天日记》、李尚毅《辛亥朝天录》、许筠《乙丙朝天录》、李民寅《西行录》、李廷龟《庚申朝天录》、吴翻《己未朝天录》、安璫《驾海朝天录》、吴允谦《海槎朝天日记》等。

(四)“燕行录”成熟期

这一阶段是从朝鲜朝仁祖元年至景宗四年(天启三年至雍正二年,即1623—1724年),为明末至清初时期,随着明朝的覆亡与清朝的兴起,朝鲜朝被迫向清朝称臣纳贡。燕行使臣创作了大量前往沈阳、北京的纪行录,共305种,数量庞大,诸体皆备,且基本定型,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等为典型,标志着“燕行录”成熟期的到来。其他的作品有李民宥《朝天录》、李德迥《朝天录》、未详《航海朝天图》、洪翼汉《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李屹《雪汀先生朝天日记》、未详《昭显世子沈阳状启》、申濡《沈馆录》、麟坪大君李滉《燕途纪行》、姜栢年《燕京录》、金锡胄《捣椒录》、崔锡鼎《椒余录》、柳命天《燕行别曲》、朴权《西征别曲》、姜覲《看羊录》、李颐命《燕行杂识》、李器之《一庵燕记》、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李健命《塞圃斋使行日记》、权以镇《燕行日记》等。

(五)“燕行录”鼎盛期

这一阶段是从朝鲜朝英祖元年至正祖二十四年(雍正三年至嘉庆五年,即1725—1800年),是清王朝的全盛期,也是朝鲜王朝平稳安定的时期。以李德懋、朴趾源、柳得恭、朴齐家、洪良浩、

徐浩修、赵秀三等人代表，将“燕行录”的创作推向了鼎盛，共有235种。代表作有姜浩博《桑蓬录》、金在鲁《燕行录》、俞彦述《燕行诗》、黄梓《庚午燕行录》、俞拓基《沈行录》、李基敬《饮冰行程历》、李商凤《北辕录》、蔡济恭《含忍录》、李德懋《入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洪良浩《燕云纪行》、朴齐家《戊戌燕行诗》、姜世晃《燕京编》、金照《观海录》、赵秀三《燕行纪程》、徐浩修《热河纪游》、柳得恭《热河纪行诗》、白景炫“燕行录”、李在学《燕行日记》等。

（六）“燕行录”衰微期

这一时期是从纯祖元年至高宗三十一年（嘉庆六年至光绪二十年，即1801—1894年），此时清朝与朝鲜王朝同时走向衰微，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侵入与国门洞开，以及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落败，朝鲜独立，旋为日本吞并，燕行使从此辍绝。在“燕行录”的创作方面，共有348种，虽然数量最多，但无论从体裁内容，还是质量水平方面，皆无法超越前辈，进而走向衰微。代表作有李晚秀《輶车集》、李海应《蓟山纪程》、金正喜《燕行诗》、李鼎受《游燕录》、李肇源《黄梁吟》、朴思浩《燕蓟纪程》、韩弼教《随槎录》、金景善《燕辕直指》、李尚迪《丙丁燕行诗》、赵凤夏《燕蓟纪略》、李有骏《梦游录》、徐庆淳《梦经堂日史》、柳厚祚《柳万笔谈》、洪纯学《燕行歌》、柳寅睦《北行歌》、郑健朝《北植谈草》、姜玮《北游日记》、金允植《天津谈草》、鱼允中《西征录》、李承五《燕槎日记》等。

而“燕行录”的整理与研究，我们也可以简单分为三个时期：上世纪30年代为初始期，60至90年代为发展期，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为全面爆发期。

四、“燕行录”的整理、辑佚与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就“燕行录”的整理而言，《燕行录全集》《燕行录续集》与《燕行录全编》等大型丛书的出版，给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亟待研究与解决。其中，主要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版本信息不明，研究者无从考查

《燕行录全集》与《续集》所收书籍，全都没有注明出自何种版本，藏于何地。研究者想进

一步核究，却苦于无线索可追寻。从古籍整理的角度讲，这是《全集》最大的问题之一。其中凡是辑自“燕行录”作者文集者，如裴三益《朝天录》，出自裴氏《临渊斋先生文集》卷三至卷四；郑昆寿《赴京日记》，出自郑氏《栢谷先生集》卷三等。这些书籍读者可根据影印书页的行款版式与书题等，按图索骥，以寻觅其版本来源。另一种情况则是原书藏于馆阁或私家，如孤行于世的稿本、钞本等，人所罕见，如郑澈《文清公燕行日记》、李廷馨《朝天录》、权恢《石塘公燕行录》、金中清《赴京别章》、许筠《乙丙朝天录》等。此类书籍，无从考查其版本来源，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与困惑。

（二）重收、误收与漏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由于《全集》所收书籍众多，又编纂时日有限，不能一一细考，故关于作者姓名、出使年代、原书书名等的考订以及“燕行录”的重收与误收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有作者姓名误甲为乙者，有作者姓名原题“未详”而实可考知者，有原具作者姓名而实为“未详”者，有原署书名有误当从其本来书名者，有原书非“燕行录”而误收者，有非燕行诗文而误入者，有原书前已收录而后又重收者，有燕行使出使年代失考者，有全书页码重复、错排、倒置与脱漏者，有其他失误者，等等。这方面此前已有林基中、夫马进等学者做了不少的工作，而集中考辨纠误者则有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订》与笔者《〈燕行录全集〉考误》。

（三）贪大求全，多收滥收

“燕行录”各类丛书的编辑，愈往后，所收愈多，但却导致贪大求全，以至滥收。例如，《燕行录全编》第一辑所收释义天《大宋求法录》、申贤《华海师廷对录》、释普愚《太古游学录》、释懒翁《大元访师录》等，多为佛家求法而入中土，此类若均以“燕行录”而收录，将会导致泛滥漫衍而不可收拾。

（四）编纂疏忽，内容错讹

《燕行录全集》重收、误收等情况非常严重，考虑到是初次整理，又仅有林基中教授一人勉力而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古籍整理，应该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才能在版本选择与校勘质量等方面不断提高，给读者提供更好的文献资

料。例如《燕行录全编》的整理编纂，应该相较《燕行录全集》在辑佚成果与编校质量方面更上一层楼，但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我们在此仅举两例，可以看出编校者的疏忽与随意。例如，高丽朝高宗二年（1215），陈澹出使金朝，《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一册收有陈澹《燕行诗》（笔者辑为《使金录》），共录《奉使入金》《游五台山时公因王事往关东作》与《使金通州九日》三首，且言“陈澹曾以书状官奉使入金朝，此行经过五台山，当在金都南迁以后，即金宣宗二年，南宋宁宗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高丽高宗元年”。^{[7](391~393)}这里的“金宣宗二年”，年代指示不明，容易混淆。宣宗有贞祐（共五年）、兴定（共六年）、元光（共二年），皆至二年，此当为贞祐二年（1214）。“金都南迁”指贞祐二年三月，蒙古与金朝和议成，金宣宗南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事。《全编》辑录者考证陈澹出使年代，乃据其游五台山诗，故称“此行经过五台山”。然此说大谬不然，陈氏诗中之“五台山”，非中国山西之五台山，乃高丽朝江陵之五台山。陈澹出使返国后，曾因王事赴关东，游江陵五台并诗以记之。故《全编》所收陈澹《游五台山时公因王事往关东作》，乃因山名相同而误收。且使臣出使期间，王事鞅掌，所负重大，行程紧迫，归途为亟。五台山偏在远途，使臣何暇何胆，纾道攀山，游览名刹，而问仙求佛耶！

又如，《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三册收有成石璘《金陵诗》（实际成氏未有出使记录），但其影印仅有一页的原稿，却与第一册陈澹书页册完全相同，是陈氏《梅湖遗稿》中的两页缩印，不知是笔者所见《全编》版本偶误，还是本来就印错了。如此粗疏的编校质量，令人颇为感慨。他如《全编》的人物小传与内容介绍文字中，成石璘，号独谷，其著述为《独谷集》。而《全编》用“谷”作繁体字“穀”，不知“谷”与“穀”的简、繁体字字义完全不同。繁简字使用的这种混乱情况，《全编》中触目皆是。

（五）今后整理编纂的方向——“燕行录”相关分类资料集

“燕行录”数量繁多，历时长久，一地古迹，多人咏歌，一起事件，众家有评，谁先谁后，谁是谁非，需要纵向做探根溯源的追踪，也需要横向排比考校的调查。有鉴于此，“燕行录”将来

后续的整理编纂工作，不应该再是大型同类文献的重叠与堆集，而应该是按类型辑录文献的类编。只有按类编列材料，才能做好纵向探究与横向对比的工作，并从中排查出先后次序与对错是非来。

例如，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燕行录”北京史料类编》就是这样的整理工作。我们以明清北京所辖行政区划为范围，对《燕行录全集》与《续集》中所有相关北京的文献，按照人物、军政、建筑、风景（含文物古迹）、礼仪、食货、风俗、交通、文教典籍、文化学术、民族宗教、中外关系、其他等分为13大类。每类之下又细分小类，如“人物”类又分为皇室、官员、士子、百姓、艺人、鞑子、其他等7类，“食货”类又分为农田水利、钱法赋税（含典当、票号、银行等）、仓储、商业石矿、各类资源（含木、石、柴、炭、煤、茶、酒等）、军民工匠（杂役）、灾赈（含旱灾、水灾、火灾、蝗灾、地震、瘟疫、救济等）、市肆、动植、其他等10类，“文教典籍”类又分国子监、学校（府学、州学、县学、义学、社学、书院）、科举（文举、武举、制科）、医学（医院）、学堂（含新式学校）、乐学、修书（实录、国史、起居注、圣训、玉牒、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群经疏解、文学艺术、其他书籍）、典藏（藏书楼、图书馆）、其他等9类。《类编》完成以后，相信会给研究“燕行录”与北京文史的同行提供极大的便利。

笔者认为，此类将“燕行录”以时代为序、按类编纂史料的工作，是未来整理编纂的新动向，方兴未艾，而且为学术界所亟需。

（六）关于“燕行录”的辑佚问题

就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燕行录”的收集与辑佚情况来看，《增补燕行录丛刊》收录最全，共有约560种。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的遗漏与缺失。笔者从2007年开始，从《韩国文集丛刊》《韩国文集丛书》等书及零散韩国古籍中，着意辑佚《燕行录全集》未收的“燕行录”，共辑得165种。当时《燕行录续集》尚未公开发行，后来得到林基中教授所赠《燕行录续集》目录，经过核检，笔者所辑与《续集》重复者有28家，剔除之后仍有137种。另外增入《同文汇考补编》所收374种“别单”“闻见事件”与“手本”等，截至目前总共得到1070种“燕行录”。

但笔者所辑范围，尚未包括《朝鲜王朝实

录》《边备司膳录》与《承政院日记》等文献，这些文献中存有大量的《状启》与《闻见事件》等。另外，在中国明清士大夫别集中，也收录了部分与朝鲜使臣往来的诗歌、札记与书信等，这些文献都有辑佚的必要性。笔者预估如果再行辑佚的话，仍能辑得数十种到上百种，甚至更多。

（七）关于“燕行录”的翻译问题

“燕行录”的翻译，主要指韩国学术界所做的“国译”工作，即将原来的汉文本翻译成今日通行的韩文本，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今韩国古典翻译院）主持的《国译燕行录选集》（1976—1982），先后出版10册。另外，单册“燕行录”的翻译，时有面世。但此类翻译，因为译者对古汉语的理解能力与识读汉字草书、行书等的能力不足，所以在具体翻译中会造成错认汉字、句子破句与翻译诗文的错讹等问题，而且问题相当严重。笔者曾有文章做专门的研究。与此同时，尚有约30种谚文本“燕行录”，也有翻译为汉语的必要性，目前所见仅有洪纯学《燕行歌》等的部分翻译，此项工作尚属于空白阶段。

（八）关于“燕行录”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与索引编纂

从“燕行录”资料数据库的建设情况来看，以林基中教授为主的韩国学术界已经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燕行录全集》《增补燕行录丛刊》《韩国文集丛刊》《朝鲜王朝实录》《承政院日记》等，或为原文的PDF版，或为可检索的汉语文字版，虽然版本选择、文字识读与标点断句等，都问题多多，但的确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中国方面，“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以《燕行录全集》为数据库资料来源，运用OCR技术，建立了“韩使燕行录资料库”。该资料库采用分册显示，支持文字搜寻、复制等功能，有文字和原文图像两种，既可以看到文本，也可以对照原文，使用起来十分便利。

今后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将目前所发现的千余种“燕行录”全部整理点校并进行数据库建设，做到能够全方位检索。同时，有关“燕行录”研究的专著与论文，应该先进行诸如《“燕行录”研究论著索引》之类工具书的编纂，并在此基础上编纂研究专著与论文的数据库，与原始史料相

配合，给研究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五、“燕行录”文献的重复与抄袭问题——以燕行使咏“十三山”诗为例

燕行使臣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自鸭绿江西渡后，沿着辽东半岛向北京行进。其沿途所见四季景色，山水文物，多半相同，而每至一地，他们都兴起吟咏，感慨抒怀。但在这些海量的诗作中，真正句新意奇，独领风骚的佳作，并不多见，而诗意寡淡，语意重沓，前后相袭，陈陈相因的诗作，却充斥卷中，味同嚼蜡。在此，我们仅以燕行使路过或夜宿海州十三山站时，所创作的有关“十三山”的诗歌为例以明之。

十三山，明代属广宁右屯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置十三山堡，后设驿站，隶辽东都指挥使司。今属辽宁凌海市石山镇，因镇内有十三座花岗岩山峰而得名，后误传为“石山”，辖区内驿马坊村即当时的驿站所在地。

明清两代，燕行使沿陆路前往北京，必经十三山，且入宿驿站，他们留下了不少歌咏十三山的诗作，但其诗无论起兴取譬，还是涵咏意境，大都不会超过以下两类：其一，以巫山十二峰为喻，或者称剩余一峰，或者称多出一峰；其二，倘经过之日期恰好为某月十三或出使十三年后再来等，凡有数字相偕者则以之入诗。例如，与巫山十二峰相对“剩一峰”类型诗句：

流年惊闰月。神女剩奇峰。^{[8](557)}
山到苍梧才数九。峰排巫峡不成三。^{[9](51)}
神鳌戴立疑三岛，巫峡飞来剩一峰。^{[10](98)}
天工削出玉芙蓉，比却巫山剩一峰。^{[11](108)}
行人指点争相语，移却巫山剩一峰。^{[12](449)}
绵络楚疑添四岫，飞来巫峡剩余峦。^{[13](203)}
移将巫峡何峰剩，分得天台几点刚。^{[14](51)}
巫峡形符胡剩数，医闾势敌可相参。^{[15](350)}
河图比却除双数，巫峡较来剩一鬟。^{[16](25)}
试数峰多少，巫山剩一峰。^{[17](274)}

再欣赏“多一峰”类型诗句。如：

若把巫山比，空多一片峰。^{[18](451)}
十二巫山又一峰。参差削立玉芙蓉。^{[19](32)}
巫阳添一嶂，蓟北控三边。^{[20](169)}
巫闾何似楚巫山，螺髻多于十二峦。^{[21](382)}
河连辽水三叉合，峰似巫山一髻多。^{[22](119)}
蓬莱一脚添娟妙，神女休夸十二峦。^{[23](439)}

知是老仙差手算，算来巫峡一峰添。^{[24](266)}
若道辽阳有神女，一峰何事等闲添。^{[25](49)}
山如巫峡峰加一，地过医闾里又千。^{[26](21)}
峰如巫峡还添一，地接燕都路恰千。^{[27](347)}
莫是巫山嫌少一，故教添作十三山。^{[28](445)}
疑是楚台添一朵，梦中云雨有谁攀。^{[29](253)}
肩立参差玉女鬟，巫山添得一峰山。^{[30](402)}

再看以日时数字堆砌入诗句者。如：

好在当时三五月，今宵又复十分圆（七月十五日宿此驿，归来又九月十五日）。^{[31](321)}
十年三过十三山，危鬓空洞道路间。^{[32](493)}
五月十三日，行到十三山。^{[33](524)}
三十年前三十岁，十三日抵十三山。^{[34](187-188)}
十三初到十三山，翠壁层岩手可攀。^{[16](25)}
十三日到十三山，此去何时干事还。^{[35](10)}
前后腊天经此地，十三日又十三山。^{[36](283)}
六十年来三世迹，十三日辄十三山。^{[37](79)}
六十年来三世迹，十三日到十三山。^{[38](296)}
夜宿晨征大野间，十三日到十三山。^{[39](294)}

在上述使臣之前的朝鲜半岛作家咏十三山，今可考最早者为高丽朝陈湑、李允甫。二人同夜直禁林，时有曾出使金朝的书状官某言，广宁有十三山，题咏颇多，皆浅近未能破的，请两君赋之：

陈即援笔云：“巫山十二但闻名，驿路偷闲午枕凉。剩骨一峰云雨恼，傍人应笑梦魂长。”
李云：“六七山抽碧玉簪，葱茏佳气射朝骖。从今嵩岳嘉名减，只数奇峰二十三。”又云：“少年蜡屐好登山，踏尽衡巫岱岳间。五老八公游未遍，不知藏此此中慳。”^{[40](277)}

从上文列举的燕行使所咏“十三山”的诗作可以看出，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但却不能超越前辈，脱出藩篱。甚至可以说比兴无奇，诗意平淡，前后相袭，敷衍凑合。只要将前后使臣写同一山川同一古迹的诗作做一比较，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他们也自觉无趣，感慨“恨无谢眺惊人句，快写平生芥蒂胸”，^{[48](98)}这倒真不是谦逊而是实情了。

“燕行录”千余种，钞撮堆砌、前后相袭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抄袭行为并不复杂，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朝鲜半岛古代书籍

如《高丽史》《通文馆志》《同文汇考》等书的钞录，以及对中国书籍如《大明一统志》《肇域志》《日知录》《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清会典》《清文献通考》《国朝诗别裁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与沿路各处方志如《通州志》等的钞录；一类是“燕行录”中名著的抄袭，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洪大容《湛轩燕记》、徐浩修《热河纪游》、金景善《燕辕直指》等，实际这些书也大量抄撮他人之书，后人对他们书籍的钞录就形成了两重甚至三重以上的抄袭现象。抄袭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原书原文大段的直接钞录，有的说明出处，有的不说明出处；一种是对原文的改写，有增有删，这种情况更为普遍。

关于诸家“燕行录”前后相袭的现象，林基中、夫马进、张伯伟等均有关注与研究，笔者在十余年的翻检过程中，也发现问题相当严重。如金中清《朝天录》一书，多袭自苏光震《朝天日记》。李宜显《燕行杂识》中条目，若论渡江至北京之沙尘，溺器使用习俗等，多抄自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金学民《蓟程散稿（考）》，实为李海应《蓟山纪程》的翻版，金书当是1855年以后的朝鲜文人游戏之作。^{[41](538)}又如朴永元《燕行日记》三卷，夫马进以为“本书属于一部记述单调的日记，几乎感觉不到著者的真实心情”。^{[44](251-252)}又如洪敬谟《燕云游史》有抄袭李商凤《北辕录》的部分，夫马进以为其对东岳庙的记载“与李商凤书中的长篇记述几乎完全相同”。^{[42](252)}又郑德和《燕槎日记》三卷，夫马进以为是抄袭自佚名《随槎日记》。郑德和燕行时为户曹参判，年已六十六岁，且自作诗称“白发元非求富贵”，以如此高官高龄，“因何剽窃，实不能明也”。^{[43](206)}

又据张伯伟考证，旧题徐有素纂《燕行录》16卷，作者应为同行伴倘李永敬，是书抄自中国史籍如《大清会典》《清文献通考》《宸垣识略》《广舆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以及朝鲜朝南龙翼《闻见别录》、姜沆《看羊录》、申维翰《海槎东游录》《海游闻见杂录》等。^{[3](17-22)}此《燕行录》16卷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即全书是在原来简本日记的基础上不断增润，历时久长，导致作者有误、成书时间有误、书籍内容存在大量间接与直接的抄袭现象，愈增愈多，愈多愈失，如果以此为可靠史料而加以征引，就不可能得出信实的结论。

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抄袭现象，就是燕行使本人在后次使行中，所作诗文大量抄录与改编自己前次使行时所作的诗文。如洪柱元曾四度出使清朝，其诗谓“十五年间四此行，菁华凋尽鬓霜明”^{[44](542)}者，即纪其实也。今观洪氏诗作，其前后所作，语意重复，句多类似。如《腊月二十五日入玉河馆》《入北京》《到北京》三诗，分别为前后三次出使时作，皆为五律，而几为一首诗，唯首句及末二句略有更动而已。其三诗分别曰：

长程六十日，今日入朝阳。已识非吾土，还如返故乡。归期亦可卜，客意一何忙。古馆重门掩，寥寥对短墙。^{[44](533)}

长程几千里，今日入朝阳。亦识非吾地，还如返故乡。归期从可卜，客意一何忙。记得前宵梦，分明侍北堂。^{[44](535)}

离京五十日，今始入朝阳。亦识非吾土，还如返故乡。归期从可卜，客意一何忙。造次须忠信，艰辛屡备尝。^{[44](536)}

宋时烈谓柱元诗“声韵浏漓，而绝无珂马春陌之气象，句语瞻蔚，而时有郊寒岛瘦底意思”。^{[45](303)}今观其诗，前后抄撮，鲜有新意。时烈之语，显系谀佞之辞矣。

六、“燕行录”文献史料的真伪问题——以任权《燕行日记》与权穰《朝天录》为例

在如此众多的“燕行录”中，除了内容重复、相互抄袭之外，还有颠倒是非而伪造事实的情况出现，试以任权《燕行日记》与权穰《朝天录》为例以明之。

中宗三十四年（嘉靖十八年 1539）闰七月二十七日，朝鲜朝遣汉城府判尹权穰为陈奏使、礼曹参议任权为冬至使，而司练院献纳尹世忱为兼两起使行之书状官，同日拜表离发。此行权氏所陈奏之事，仍为朝鲜朝王室宗系改正事。朝鲜朝为宗系改正事，前后屡有陈奏。今次权穰复又来陈奏辨诬，嘉靖帝勅曰：

尔国数以宗系明非李仁任之后来奏，我成祖及武宗朝，俱有明旨，朕亦具悉矣。但我高皇帝祖训，万世不刊，他日续纂，宜详录尔辞。尔恪共藩职，朕方嘉尔忠孝，可无遗虑也。其钦承之。^{[46](324)}

权穰返国后，因功“加资，田地并四十结，

外居奴婢并五口”。^{[47](2月9日壬申条)}其书状官尹世忱、通事李应星亦因功而加资，并赏田结。但权氏《朝天录》十一月二十一日之日记末注曰：

《海东名臣录》任公权事中有曰：己亥，以冬至使赴京，与宗系奏请使偕行。中路下书曰：“卿等使事虽殊，宜相谄委，若一人有故，可代行。”及到京，奏请使病不出，公独诣礼部，辨明数陈，言意诚款，乃蒙允俞，使还行赏，竟不及公，公略无片言出于口，初若不与知者，人以此益多公，而嗤彼之不让云。按先生日记中，备载当日事首末，先生入京后，未尝一日有病，亲诣礼部者三，遣通事者六，乃得准请敕旨。及竣事还归之日，先生适以足疾，不参于上马宴，任公与奏请书状官跪阶上，令奏请上通事，致谢意于尚书而已。此一款外，别不见任公致力处，而录中爽实如此，殊不可晓。况使事既殊，赏典自有所归，而及至行赏，先生犹且恳辞，详见于《行状》及碑铭，则所谓“嗤彼之不让”者，尤不足多辨矣。兹并录之，使览者有所考焉。^{[46](314-315)}

由此可知，权、任两起使行归国后，关于宗系辨诬中的功绩，在当时就有争议。今考任权《燕行日记》所记，在途多简略，但在京记宗系辨诬事，则所动所言，极为详尽。其可怪者，任氏书中所记，与权穰《朝天录》几如出一人之手！

两家日记俱在，今可按而考，以明其情及前后抄袭之迹。盖任氏之书先成，而权氏后人抄撮剪裁者。何者？其一，奏请使权穰自沿路至北京，奄于病痛，几成废人。八月二十二日，两起使臣至平壤，“奏请使因酒不平”，直至二十八日，皆因病不出。^{[48](370)}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海州，“奏请使气不平”。翌日，“不能乘马，使通事崔世瀛买车于西驛馆”。^{[48](372)}及抵玉河馆后，自十月二十八日起，奏请使便“因病不出”，凡私访朝士之家，若龚用卿、华察、薛廷宠等，或往礼部奏请一应诸事，皆任权与通事李应星同往。如十月二十八日，权氏记称“遣李应星将赍来物件送于龚明使，适不在家，又往薛明使家”。^{[46](362)}任氏记曰“奏请使因病不出，吾与李应星将赍来物件送于龚明使，适不在家，又往薛明使家”。^{[48](387)}又如权氏记称十一月六日“凌晨诣阙，以下马宴往会同馆，千秋使以上马宴亦往”，七日“与千秋使、冬至使率一行人诣阙谢恩后还馆”。^{[46](369-370)}任氏记称“奏请使病不出。凌晨，我独诣阙下，以下马宴往会同馆。千秋使以上马宴亦

来”。七日，“吾与千秋使率一行诣阙谢恩后还馆，奏请使病不出”。^{[48](392-393)}据此，则自抵馆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马宴期间，百凡诸事，皆委之任权与李应星。唯自腊月四日至十六日期间，任权因呕逆症不出，权氏行之，其时使事已成矣。权氏记中，于平壤及沿途病痛之事，记载大同于任氏。而于在玉河馆期间萎顿不起之事，则百般隐瞒，其记中或模糊其词，或俨然自往，其实皆任、李二氏代行也。

其二，初，两起使行八月三日在“金岩驿道上，见进贺使李芑之通事先来，去书状官柳公权六月十七日死于北京，元继蔡七月二十四日死于通州地”。^{[48](365)}八月十日在平壤（任氏误记为十一日），权氏录中记“灾伤御史吏曹正郎任虎臣自中和到，同舟而行”。^{[46](333)}而任氏《日记》载“灾伤视察救恤御史长侄虎臣自中和来到，而自上有下书曰：‘卿等使事虽殊，宜相谄委，一人有故，可以代行云。’”^{[48](367)}盖柳公权死讯已达于朝廷，中宗惧权氏年老多病，为防不测，故有如此下书。又十一月八日，权氏记“千秋使率一行诣阙辞朝，以尚书不坐，是日不得发”。^{[48](371)}此下再无文字。而任氏于此下记曰：“还馆设酌，三使饮酒相话。奏请使曰：‘冬至使任务已毕，祇受钦赏，事当即发’，而吾之老病如是不健，情难分离。且有殿下下书‘一人有故，可以代行’之教，故因我久滞寓馆，见甚惘然。”^{[48](394)}由此可知，权氏有意漏载国王“一人有故，可以代行”之谕；而任氏详载之，即便胆大包天，谅其也绝不敢捏造教谕，干冒欺君罔上之罪以蒙殒世人也。

其三，今考权、任两家之书，一路记行全同，详则皆详，略则皆略。记中所记诸事相迭相合，两起使行沿路同行，所接所遇皆同，尚可有说；而每日记载文字，亦几全同，则殊为不可解之事。或偶有详略，间有错讹。如十一月“十七日晴，免朝”。十八、十九日皆如之，权氏之录如此，而任氏所记亦同。权氏载“二十日，缺。使书状往观天坛”。^{[46](276)}而任氏记“吾与书状官及一行，往见天坛”。^{[48](398)}下详记天坛所见，而权氏亦如之。则两家所记，必有一人先成，后者为抄撮前者而成矣。

其四，权橚在馆期间，所呈状启，于翌年正月初五日抵汉京，《中宗实录》载权氏《状启》曰：

臣等到北京，使李应星语主客司郎中曰……。翌日，遣李应星于龚天使家曰……是日薛天使，亦来主事厅，求见臣等。令李应星将宗系事，如前语之。答曰：“见礼部堂上，当为恳说。”是日，遣应星于华天使家，又告宗系事。答曰：“已详知之矣。当言于礼部尚书”云。上马宴之日，令应星告曰：……尚书答曰：……仍言于应星曰：“吾当速处。”十四日，遣李应星于龚天使家告辞。^{[47](1月5日戊戌条)}

权氏此文，皆言“遣李应星”，而未言“谐李应星”等语，则知其确实病体难支，故一委之任、李二氏，只不过在《状启》中未提任氏而已。

其五，任、权二氏书中，皆言“千秋使”，则为同年七月八日，中宗“遣参判尹思翼如京师，贺千秋”。^{[49](7月8日癸卯条)}千秋行先发，故任、权两起抵馆时，千秋使一行仍在馆中，故任、尹二氏相谐入阙。且尹思翼于是年岁末返国，《中宗实录》记载他们一行回到京师，上引见。思翼谓：“龚天使来见玉河馆，……言于礼部郎中许礪曰：‘朝鲜使臣，得病欲速出，且房舍亦必污陋，须洁净修扫以处之可也。’”^{[50](12月30日癸巳条)}此处龚用卿谓“朝鲜使臣，得病欲速出”。此得病使臣，必陈奏使权橚无疑，且龚氏如此叮嘱，而许礪也果真来探望并命人打扫馆舍，由此可知权氏不仅有病，且病体严重，这也从侧面证明任权并未说谎，而是权氏所言不实矣。

又，权、任二氏返国谒阙，奏请使权橚、书状官尹世忱、通事李应星皆加资赏田，而一不及任权。故《海东名臣录》载任氏之言，以记其实情，而权氏后裔，又书论辨之。考任氏于《日记》末亦曰，赏赐“竟不及我焉。奏请使长我九岁，而年老多病，事多代行，然于朝无片言出于口，若勅不与知者，而见苏贰相世让略言之”。^{[48](409)}盖任氏不平，告之苏世让，故其后司宪府启查权橚此行，与冬至使任权偕行，见《中宗实录》及权氏《日记》。权氏因陈奏得赏，俱见上条。《中宗实录》载，当时宪府启：“今此宗系改正事，专由圣上事大以诚，而命依赏南袞之例。南袞则呈文礼部，往复奏请，非权橚只赉表文之比。施赏稠迭，至于加资，南袞所无之事，以及译官之贱，非所以赏有功也。物情骇怪，极为未便，请改成命。”^{[47](2月9日壬申条)}则当时已有物议，然中宗不听谏，仍赏如故矣。

综上所述，权、任二书，内容多同，盖权氏之书，为抄撮自任氏书而成。“燕行录”千余

家，前后抄袭不一，然如权、任二氏之雷同者，盖亦鲜矣；而如权氏之改篡日记，颠倒事实者，盖绝无而仅有。且此前使行诸家，未有此习，而恶例之开，滥觞于此（或权书抄成稍晚，亦未可知）；又使行争功，矛盾抵牾，亦始于此行。故考读“燕行录”者，不可仅以一家之说，据为定论，必前后比勘，上下求索，方知彼先此后，彼确此误，此真彼假，或彼此皆假，可不慎欤！

七、“燕行录”研究中的态度与方法问题

如前所论，目前存世的千余种“燕行录”，固然是研究古代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史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但又是真伪参半而疑信皆存的高风险资料。如何辨别真伪，去伪存真，则需要研究者持正确的态度与方法。笔者现在此提一些建议，其实多是老生常谈，新意无多。

（一）高度重视与考辨文献资料的真伪性

在历史研究中，面对纵跨千年的文献资料，考校真伪、判定是非是学术研究中最起码、最基础的工作，而“燕行录”研究中尤当重视这一点，因为这千余种资料中真伪混杂、前后相袭的情况非常严重，远较常见的史料为多。如上举任权《燕行日记》与权穰《朝天录》，如果不是比勘研究的话，就很难发现究竟谁记录了事实，谁篡改了事实，如果相信权穰《朝天录》所记为真实的史料，就会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得出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二）寻源究委，弄清脉络

目前“燕行录”研究的专著论文，日渐增多，但研究者往往只着眼于针对某位燕行使、某部“燕行录”或者某个问题做孤立的个案研究。发现某一观点与认识，就往往以为是滥觞于所研究的对象，而事实上这种观点与认识前代燕行使早已提出，甚至不止一人有如此言论与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做追根溯源的工作，调查清楚此语此论最早是何人所言，后来者究竟是重复抄录此说，还是有所发挥，甚至是误会误解。由于“燕行录”文献前后重复、相互抄袭的情况非常之多，如本文前举歌咏“十三山”的诗歌，如果研究燕行使文学作品的学者，随意拈出一首诗，评价赏析，以为作者将“十三山”与“巫山十二峰”相系联，与“十三日”相偕，以为是奇

思妙想，有创新性，而不调查此种比附前人早已有之，其研究结论难免会陷于空虚化，而毫无参考意义。

（三）纵横交错，比观照应

“燕行录”所涉及到的历史，纵跨近700年；而在同一时期，又与中、韩、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有横向的联系与交往。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在资料运用上有纵横交错、比观照应的方法。目前“燕行录”的研究，看起来热闹非凡，专著论文不断涌现，但有突破性的成果并不多见，就是因为研究者多做孤立的个案研究，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就某位燕行使、某个事件做判断与评价，但实际某一问题与某种现象的发生与变化，是前有因且后有果的，片断、局部与盲人摸象般的研究，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不仅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反而会造成更糟糕的恶果。正如张伯伟教授所说，我们会走出一个深坑，然后又栽入另一个深坑中。张伯伟教授说过：

就各国的行纪文献而言，无论是朝鲜半岛的朝天使、燕行使、通信使行纪，还是日本僧人的巡礼、参拜行纪，或是越南文臣的北使行纪，其中所提供的记录是新鲜而生动的。这一方面可以让读者真切接触到一幕幕历史场景，但也有引导研究者坠入某个无关宏旨的片段的危险。因此，研究者更加需要汉文化圈的整体视野。在这样一个框架中，研究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便可能形成如唐代船子和尚《拨棹歌》中所说的，是“一波才动万波随”的状态，我们需要这样的综合研究。^{[3](25)}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有纵深考察与横向对比的观念与方法，既考察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又研究其在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与效果；既研究单本的“燕行录”，还要多方考察诸家“燕行录”，并参考当时与后世其他史料，参稽比对，互相考证，才能得到客观而平实的结论。

（四）“异域的眼光”有障翳，本土的观察是本根

中国学术界的的历史研究，向来被诟病像封建帝王一样，“以自我为中心”而“以中国解释中国”，既不参检周边的史料，也不管顾周边的感受，即便提所谓“东亚”或者“东北亚”，也

仍是以中国为中心。近百年以来,却又被“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优越论”,用“以西方来透视中国”的研究方式所逼迫,人云亦云,压得喘不过气来。同时,对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与明清史的学者来说,传统纸上史料已经开发到山穷水尽的程度,而韩国、越南等国使臣出使中国的纪行录文献,提供了大量可供参稽的宝贵史料,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给研究者以新喜与希望。“燕行录”文献确实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富矿,研究者入其矿山,左采右得,收获甚丰。但在目前“燕行录”的研究中,存在着任意夸大其史料价值与重要性的现象。通过本文的论述即可明白,在如此庞杂纷乱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不住的,甚至是伪造、抄袭、错误的,如果不加鉴别地信以为真,引据论证,就会把楼台建立在沙滩之上,一旦证明所用资料不足采信,则楼台坍塌是必然的现象。

学术界近些年来通过“异域的眼光”反过来观察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这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理念。但这些“异域的眼光”,除了从史料采择、真伪辨别、观察与判断的可靠性诸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受意识形态的阻碍,他们所记所言与事实往往是相反的。尤其是入清以后前往北京的使臣,表面在皇宫跪拜兴起,持节如仪,但骨子里衔恨怀愤,悲切莫名。在他们笔下,清廷是蛮夷的世界,腥膻羯臭,山河异色,文明不再,政治昏暗,皇帝荒淫,官员贪黷,百姓流离,他们对从皇帝到平民的咒詈与污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朝鲜朝君臣巴望着“胡无百年之运”的古语早日变成现实。因此,在其笔下就不可能有客观的叙述和史实的纪录,如果将他们的纪行文字,当成真正的史实,就不可能得出正解的结论。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异域的眼光”有翳障,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与记录他们所闻所见的事物,要仔细分析考辨,弄清事实后,才可放心使用这些史料。如果不加考证与分析地过信“燕行录”,包括日本、越南等国人所撰的纪行录,反而放弃了大量中国史料的运用与引证,从一隅转向另一隅,最终将历史研究引向偏离轨道的歧途与虚化的世界,笔者以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历代史籍浩如烟海,本土的观察与记载,仍必须占据主导与核心的地位,否则会失去本根。本根

既失,则万事瓦裂。本土文献与异域文献相结合,古今相较,纵横互勘,以我为主,兼采他说,才是正确的方法。

参考文献:

- [1] 邱瑞中:《燕行录学引论》,《燕行录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2] 宁侠,李岭,曹永年等:《为“燕行录学”的建构呐喊》,《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0期。
- [3] 张伯伟:《名称·文献·方法——“燕行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燕行录”研究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
- [4] 漆永祥:《〈燕行录全集〉考误》,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编:《中国学论丛》(第24辑),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2008年。
- [5] [韩]承文院编:《同文汇考补编》(卷7),国史编纂委员会整理:《同文汇考》(第2册),首尔:韩进印刷公社,1978年。
- [6] [韩]金中清:《朝天诗》,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1)》,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7] [韩]陈泽:《燕行诗》,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8] [韩]李穡:《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3)》,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9] [韩]申用溉:《次望十三山韵》,《韩国文集丛刊(1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10] [韩]高敬命:《道中望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4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11] [韩]郑弘翼:《燕行录·十三山》,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5)》,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12] [韩]申晷:《燕行录·十三山》,《燕行录全集(22)》,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13] [韩]金锡胄:《捣椒录上·閤阳途中望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145)》,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14] [韩]吴道一:《燕槎录·望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15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15] [韩]李宜显:《十三山次副使韵》,《韩国文集丛刊(180)》,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16] [韩]姜覿:《看羊录·十三山偶吟》,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0)》,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17] [韩]申厚载:《葵亭集·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续集(4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

- [18] [韩]李承召:《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1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19] [韩]李廷馨:《过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58)》,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0] [韩]崔睨:《登十三山赠儒生》,《韩国文集丛刊(6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1] [韩]黄床:《十三山(三首之三)》,《韩国文集丛刊(103)》,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2] [韩]李景奭:《燕行录·望十三山》,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8)》,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23] [韩]姜栢年:《燕京录·到十三山偶吟》,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9)》,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24] [韩]南龙翼:《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13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5] [韩]李瑞雨:《途中望十三山次南云卿(龙翼)韵》,《韩国文集丛刊(4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6] [韩]金寿恒:《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133)》,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7] [韩]李健命:《宿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17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28] [韩]赵文命:《十三山》,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192)》,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29]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十三山》,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41)》,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30] [韩]李基宪:《燕行诗轴·次正使十三山韵》,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4)》,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31] [韩]徐居正:《十三山驿》,《韩国文集丛刊(10)》,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32] [韩]韩应寅:《十三山城外》,《韩国文集丛刊(60)》,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33] [韩]裴三益:《朝天录·十三山(其一)》,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3)》,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34] [韩]李健命:《寒圃斋使行日记·十三山戏题一律示副使书状》,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112)》,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8年。
- [35] [韩]赵泰采:《寄回还谢恩副使权台有道》,《韩国文集丛刊(176)》,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36] [韩]赵观彬:《先子燕行诗有十三日到十三日之句今行亦十三日也书此志感》,《韩国文集丛刊(221)》,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37] [韩]赵斗淳:《十三山敬次二忧先祖韵(其一、其二)》,《韩国文集丛刊(307)》,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38] [韩]赵荣顺:《王考忠翼公癸巳燕行,以十二月十三日到十三山。有诗曰:“十三日到十三山,仲父悔軒公乙丑之行。”又是十三日,而有十三日又十三山之句矣。今行亦十三日也,六十年三世之行,每值是日,似非偶然,遂感次其韵》,《韩国文集丛刊续集(89)》,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
- [39] [韩]李肇源:《关外杂咏之二十二》,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61)》,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40] [韩]陈泽:《梅湖遗稿·咏广宁府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41] [韩]高敬命:《道中望十三山》,《韩国文集丛刊(42)》,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年。
- [42] [日]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伍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43] [日]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題》,《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42号)》,2003年。
- [44] [韩]洪柱元:《无何堂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续集(30)》,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
- [45] [韩]宋时烈:《无何堂文集序》,《韩国文集丛刊续集(30)》,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1年。
- [46] [韩]权櫓:《朝天录》,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2)》,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
- [47]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92)·中宗三十五年》,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
- [48] [韩]任权:《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101)》,首尔:韩国东国大学出版部,2008年。
- [49]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91)·中宗三十四年》,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
- [50]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卷92)·中宗三十四年》,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

[责任编辑 张克军]